

面进行探究与解读,从而一窥汉人瑰丽的神怪世界。
仰的内容。本文试从济宁汉画像石的神话题材与文化内涵等方面
山东济宁地区的汉画像石上,存有大量关于神话和宗教信仰

天人合一

济宁汉画像石上的神怪世界

刘丽



图1 微山两城山伏羲女娲图 东汉



图2 嘉祥武氏祠历代帝王图中的伏羲女娲 东汉



图3 邹城双手托日交尾的伏羲女娲 东汉



图4 任城交尾伏羲女娲形象 东汉

济宁汉画像石的分布

济宁,是孔孟故里、儒学发祥之地,也是汉画像石出现年代最早(西汉早期)、出土最为集中的地区。汉画像石出土数量,在全国以山东最多,山东又以济宁最多。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济宁市已清理发掘的汉画像石墓约80座,收集和出土的汉画像石总数700余块,以嘉祥、微山、任城、邹城、曲阜等县市区发现保存数量最多。其中嘉祥纸坊镇、微山两城镇,素有“汉画像之乡”的美誉。尤其是嘉祥纸坊镇的武氏墓群石刻蜚声海内外,是中华文化的瑰宝。

济宁汉画像石的神话题材

粗略统计,济宁地区全部汉画像石中与神话题材相关的要占到1/4。这些神话题材,具体包括三类:一是以伏羲女娲为代表的创世神话。如较为常见的伏羲、女娲、羲和捧月、雷神、海神、风云之神,也有日、月、星、辰,北斗星君天象等。二是以西王母为代表的仙界传说。如西王母仙界图、东王公、羽人、升仙图、仙人出行图,也有开明兽、九头兽、九尾狐、玉兔等。三是汉代谶纬神学的祥瑞故事。有众多的奇禽异兽和奇花异草、鬼神祥瑞等。如青龙、白虎、麒麟、凤凰、神龟、龙车、鱼车等。

在以上三大类神话内容中,出现的神明形象主要如下:

伏羲、女娲 二人都是成就非凡的人类始祖,后来成为古代著名的神话人物。在济宁汉画像石中,伏羲、女娲一般人身蛇躯,两尾交合或左右对称,伏羲持规,女娲执矩(图1)。在嘉祥武氏祠,伏羲、女娲形象显示出明显的配偶关系(图2)。人们乞求始祖神的护佑,希望可以永久性留住墓主灵魂,生命无限延续(图3、4)。

西王母、东王公 西王母是我国民间传统文化中重要的神话人物之一。《山海经》记载:“西王母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啸,蓬发戴胜,是司天之厉及五残。”(图5)

《山海经》中的西王母半人半兽,并不死药的传说,这大大满足了汉人对长生不死、羽化登仙的追求,因而,西王母在汉代被大加崇信(图6)。嘉祥五老洼的画像石墓较早出现西王母形象。此时还没有出现玉兔、蟾蜍等一些后期较常见的形象。

东王公也是神人,是汉代人从对偶的观点出发,给西王母安排的一个配偶(图7)。武氏祠中,东王公的形象被安置于祠堂东壁最高位置,与西壁的西王母遥遥相对。嘉祥武氏祠及沂南画像石墓中,都是这样一种布局形式。一般比较少见,如山东临沂白庄、曲阜梁林画像石中将东王公、西王母同处于一个画面两端的相对位置上。在嘉祥武氏祠中就有一石刻他们相会之景(图8)。

羲和托日(图9) 羲和是天帝之妻,是太阳的母亲。

风雨雷电 人们想象出了水神河伯、海神以及风神雨师、雷公电母等神灵。

多头神人(图10) 汉人不但刻画出了《山海经》中的多头神人——驺虫,而且还创造出



图5 嘉祥武氏祠西王母形象 东汉



图6 嘉祥晚拜西王母图 东汉



图7 嘉祥武氏祠东王公形象 东汉



图14 邹城白虎形象 东汉



图9 邹城羲和托日图 东汉



图10 济宁任城人身多头神人形象 东汉



图11 济宁任城开明兽形象 东汉



图12 嘉祥开明兽图 东汉



图8 嘉祥武氏祠西王母东王公相会图 东汉



图13 邹城玉兔捣药图 东汉

了三头神、五头神乃至七头神。

羽人 羽人多作飞行状,姿态优美。
开明兽(图11、12) 《山海经》记载:“开明兽身大如虎而九首,皆人面,东向立昆仑上。”

玉兔捣药(图13) 西王母有长生不老之药,而为其捣药的是玉兔。

白虎(图14) 白虎为四神中的西方之神。

济宁汉画像石神话的思想渊源

汉代,处于我国封建社会的上升、思想文化的整合阶段。济宁汉代画像石中神话内容的兴起,是独特的汉代思想文化、社会风气所赋予的。

汉文化继承了楚文化的浪漫基因 春秋战国时期,以楚国为代表的巫巫文化在南方盛行。对于楚文化的特点,有学者撰文指出,就风格的基调来看,楚文化清奇灵巧,中原文化典重质实。伴随着楚向中原的扩张,在中原文化讲究端正、敦厚、雄浑的主流文化中倾注一股充满浪漫色调、奇思异想、绚丽多姿的清泉。汉统一后,在政治上承秦制,在文化艺术上,继承更多的则是楚文化的浪漫绚丽。李长之在《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中认为:“楚人的文化实在是汉人精神的骨子。”体现在汉画像石上,则是伏羲女娲、雷公电母、昆仑仙境、珍禽异兽等各种神话题材的广泛运用。

道教思想促成汉文化的神仙信仰 汉初,黄老思想成为官方的统治思想,秦汉之际,上层社会极力追求长生不老和羽化升仙,秦始皇、汉武帝等皇帝都毕生追求长生。早期道教就是这时“黄老”思想、神仙崇拜等观念相结合的产物。在民间,追求长生不老、修炼成仙的美好愿望,同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汉画像石蕴含了对死者之美好祝愿,希望死者在另一个世界过着悠游自在的生活,灵魂能够成仙。

儒家与阴阳五行思想织成汉文化的谶纬神学 汉武帝登基之初,思想上采用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董仲舒还大量借用阴阳五行等学说,不断发挥儒家经书中的“微言大义”,进而鼓吹天人感应、君权神授、大一统等思想。统治者大肆宣扬巫术迷信,把自然现象神秘化的谶纬于是广泛弥漫开来。孝的高度被进一步抬高,表现在丧葬礼俗上就是“厚葬为德,薄葬为鄙”。鬼神观念的泛化又遇上孝观念的深化,成了直接推动厚葬礼俗的浩荡之风。

汉代,兼具儒家大一统之气象与道家恣肆开张之境界,二者的水乳交融,造就了汉人气魄宏大、刚健质朴的精神风貌。鲁迅也曾赞美:“唯汉人石刻,气魄深沉雄大。”

济宁汉画像石神话的文化美学内涵

观摩济宁神话题材汉画像石,可发现济宁汉画像石中所刻画的神话及仙境,都是人理想追求中的美的境界,是按照美的法则所创造的汉代人的幻梦。

刻画阴阳相遇,崇尚生命绵延之美 在古代,人们把女娲看作是化育世间万物的神女,还把她奉为婚姻之神。汉人也非常信奉伏羲女

媧会合的神话,以及女媧转黄土造人的传说。汉画像石中,以不同形式的伏羲、女媧为表现内容的神话题材占了相当大的比重,而这一点在济宁地区则显得尤其突出。画面或为人首蛇身的伏羲女媧相交尾,或为伏羲女媧各手持曲尺、圆规相对,或做男女手捧日月相合等,均象征阴阳相遇、男女会合,创生出人类、天地、宇宙之义。汉画像石乐此不疲地表现这类题材,与汉代社会和人们对生命的态度、对死后的精神寄托有密切的关系。有学者指出:“中国生命文化的特色在汉画像石中得到了充分体现,每一块画像石都记录着汉代人的生命状态,向后人展示出汉代人生机勃勃的生命意识。”

刻画升仙长生,追求精神永恒之美 长生,是不论男女老少、尊卑贵贱,人们的一种共同理想愿望。汉代,人们由相信人灵魂不灭,逐渐演变成死后要灵魂升天的精神追求。有的幻想死者身上长出翅膀,变成“羽人”,有的则要像生前一样,乘坐车马云游。画像上的羽人头尖,四肢纤细,背上有羽,多做飞翔或奔跑状态。除了羽人,翼龙、翼虎、飞鹿、飞鹤、龙、凤、虎、鱼、灵芝等都是护送墓主人灵魂升天的祥瑞之物。画像石中的羽人与神兽,形象多姿多彩,它们或在仙境中逍遥快乐地遨游,或在人间潇洒自在地嬉戏,是富于变化、具有独特魅力的艺术形象,这些都寄托了人们对长生不死的一种热望,对自由的精神世界的向往。汉代,人人希望生命永长,统治者希望万寿无疆,百姓乞求“适彼乐土”,这都要到美丽的仙境仙界去寻找。

刻画人神一体,向往自然和谐之美 中国传统美学重视天、地、神、人诸界和谐。董仲舒提出的“天人感应”思想,以及“阴阳五行”学说盛行于汉代,在人们的社会生活、意识形态各方面都有所反映。所谓“天有日月,人有两目。地有九州,人有九窍。”(《黄帝内经·灵枢》)人们要寻求人与自然的契合,并试图以此诠释人类社会的规律和天人之间的奥秘。济宁汉画像石中,大量的人与虎、龙、鸟、象、马等共处和虎驱人首、龙(蛇)驱人首等画面,反映着天地、万物的对立、运动、变化,揭示了人与自然万物同道同造共存,同质同构互为标志、相互扶持,它们各有其存在的价值,都是人类社会不可或缺生态要素。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中说汉代艺术“通过神话跟历史、现实和神、人与兽同台演出的丰满的形象画面,极有气魄地展示了一个五彩缤纷、琳琅满目的世界。”在汉画像石的神话中,儒家理性主义的美学同充满奇丽的幻想、激越的感情、原始的巫术文化融合在一起,由此把汉代人内心情感的冲动展现为一幅幅恣纵、瑰伟、奔放、浪漫的美丽图画。

综上所述,济宁汉画像石中的神怪世界,张扬着汉代人的社会理想和文化追求,折射着汉代人的文化心态。济宁汉画像石中的神话,展现的是“天人合一”“人神一体”的思想观念,是“神为人用”的心理意念,是人们对生命与美的永恒追求。这些精美的画像石,是我们这个伟大民族所创造的伟大艺术,将以其永恒不朽的价值与魅力,向人们展示着我们民族辉煌的未来,昭示着中华文化灿烂的未来。

由漆双层五子奁看汉代男性「化妆」习俗

王娟 于兴兴



汉代漆器制造发达,是中国漆工艺史上灿烂辉煌的时代。日照市博物馆收藏有一件汉代文物漆双层五子奁,是难得一见的艺术珍品。

漆双层五子奁出土于山东省日照市海曲汉墓,此发现获评2002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奁是古代化妆所用的匣,用于盛放梳妆用品。木胎,有盖,上下两层,上层为镜奁,内置铜镜1件,铜镜上置木梳、篦各1件;下层放置5个子奁,分别为马蹄形盒1件、圆盒1件、椭圆形盒1件、长方形盒1件。器表髹黑褐漆,上中下镶嵌三周带状银扣,其间以朱、绿色漆饰云纹、鸟纹和怪兽;内底髹黑漆,以黑绿色漆绘云纹和两只鸟。弧顶盖髹黑褐漆,中心饰银质柿蒂纹,外镶嵌一周带状银扣,以朱、绿色漆饰云纹、鸟纹和怪兽。各子奁装饰风格与母奁相似,主纹样都是云气纹,浑然一体。

该墓中还出土了一枚铜印章,上书“公孙昌”字样,专家推测这可能是墓主人的名字,但史书并无记载,其身份可能是汉代海曲县的统治者。既然墓主人是一男性,怎么会出“化妆奁”呢?

“事死如事生”影响下的厚葬之风

古人认为灵魂不灭,即人死后灵魂依旧存在,在地下世界如同活人一样继续生活,“人死而为神鬼而有知”,仍然能够祸福人间。中国的“礼乐”传统也首重丧葬,儒家则保存和发展了这一传统。《礼记·中庸》认为“敬其所尊,爱其所亲,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

道家思想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受其影响汉代人对于生前和死后都有永恒幸福的祈求。因此,在汉朝人的想象中,死后的世界一如现世生活的翻版,墓室的形制和结构尽量模仿现实中的房屋,随葬品也尽量将生人所用的工具、物品纳入墓中,甚至将房屋、田地和家禽、牲畜之类也制成模型随葬,“厚资多藏,器用如生人”。
丧葬习俗既体现着当时的文化习俗,也折射着现实社会。虽然汉代“世尚厚葬,有奢泰之失”“厚葬以破业,重服以伤生”,却有利于我们探究当时的社会风尚。

古代男子重视仪容仪表

古人非常注重自己的仪表,周代已形成比较完备的衣冠服饰制度,并纳入“礼制”范围:“昭明分,辨等威”,尊卑贵贱,不可逾越;吉礼、凶礼、军礼、宾礼、嘉礼服饰配置,各有分别,不可混淆。人们在外出或会见宾客时,也精心打扮自己,《邹忌讽齐王纳谏》中“邹忌修八尺有余,而形貌昳昳。朝服衣冠,窥镜……”可见先秦时期男子对镜整衣已是常规操作。

考古发现,早在春秋早期,贵族男性就开始使用化妆品。陕西省南郑市汉城遗址刘家洼春秋芮国遗址的一座男性贵族墓发掘出了一件微型铜镜,对其残留物的综合分析结果表明,它是美白化妆品,为目前中国发现的较早的男性化妆品,也是中国已知较早的面脂。

无独有偶,湖北枣阳九连墩的战国楚墓群出土了迄今为止年代最早的便携式梳妆盒,内置一面铜镜、一个梳头发的木篦子、一把修眉刮脸的刮刀,一盒用作基础护肤的面脂,墓主人为男性。荆门包山二号楚墓为战国中晚期墓,出土了目前最早的一件完整的彩绘妆奁,墓主人也为男性。

汉代墓葬中,江西南昌海昏侯墓、河北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墓、安徽阜阳双谷堆汝阳侯墓等都出土了样式各异的妆奁。在全国各地发掘的一些中小官吏的墓葬中,也出土了大量随葬的妆奁,这说明古代贵族男性使用妆奁是普遍现象。

汉代男子也化妆

在古代,化妆并非只是女子的“专利”,男子虽然不像女子化妆般服饰繁复,但也是化妆的。

束发与戴冠 古往今来,发式不仅仅体现礼俗,也彰显着人们的审美。《礼记·曲礼上》有载:“男子二十,冠而字。”男子二十岁的时候要行加冠礼,并由长辈赐字,表示已成人。“发有序,冠才正”,冠与发式是密切相连的,土冠,庶人巾。冠礼的“冠”是用冠圈套在发髻上,将头发束住,用“纚”绕颈下系,或用“紒”系在辇的左端,再绕颈向下在辇的右端打结,将冠

固定在头上。

正因为古人无论男女都留长发,且不可随意剪发,由此延伸出了“髡”刑,即把罪犯的头发等剃光,以示惩戒。卫宏《汉旧仪》载:“凡有罪,男髡钳为城旦,城旦者,治城也。”班固《汉书·循吏传》也有此类记载。

古人日常打理头发主要包括梳理、盘结、造型、洗涤、滋润等等。这也就是馆藏文物漆双层五子奁中镜奁、马蹄形盒和长方形盒的作用:镜奁装镜子,马蹄形盒装梳篦,长方形盒装梳刷、簪等。

蓄须 古人喜欢留胡子,且胡须分类极为细致:上唇的叫“髭”,下唇的叫“须”,颊旁的叫“髯”,下巴的叫“髻”。汉代,“美髯髯”是美男子的标志。《史记·高祖本纪》记载刘邦“隆准而龙颜,美须髯”;《汉书卷六十八·霍光金日磾传》描写霍光:“白皙,疏眉目,美须髯”;《通典·官职三》记载:“渴者缺,选郎中须眉大音者以补之。”汉乐府诗《陌上桑》形容美男子“为人洁白晰,髯髯颇有须”。

汉代人重视嘴唇上面胡须的修饰,既美观,还不能影响进食。刘熙在《释名·释形体》云:“髭,姿也,为姿容之美也。”山东东平汉代壁画中,人物的头发胡须运用了钉头鼠尾描,头部如钉子,末端如老鼠尾巴。胡须的打理需用镜子、梳篦、刮刀和镊等,也需妆奁盛之。

照容 铜镜出现之前古人用水照容,所以先民有一种盛水的容器叫“明”,《说文解字》释其意为:“监可取水于月,因见其可以照行,故用以为镜。”“监”的金文为,能更直观地显示字义。《庄子·德充符》记载“人莫鉴于流水而鉴于止水。”
汉代妆奁中大多有铜镜出土,然而我们在博物馆中看到的铜镜大都不能照人,为什么呢?

这需从铜镜的制作方法说起。《淮南子·修务训》记载:“明镜之始下型,矇然未见形容,及其粉以玄锡,摩以白粉,鬢眉微毫可得而察。”古人制作铜镜时,使用白色的毛毡蘸取粉状的磨镜药玄锡反复擦拭,铜镜就可以光亮照人。然而,此法制作的铜镜易氧化,致使镜面昏暗无光,不能照人。因此,古人对铜镜的保养非常精心。日照市博物馆馆藏漆双层五子奁,上层为专门的镜奁,内装有铜镜,铜镜以丝绸包裹,出土时丝绸已朽。

敷粉 汉代男子大都“以白为美”。《史记·张丞相列传》记载:“苍法当法斩,解衣伏质,身长大,肥白如瓠,时王陵见而怪其美士,乃言沛公,赦勿罪。”刘邦因为张苍皮肤白嫩,赦免了其死罪。
汉朝贵族男子敷粉,《颜氏家训》记载:“男子傅粉之习,起自汉魏,至南北朝犹然也。”《汉书·佞幸传》中载:“公卿皆因关说,故孝惠时,郎侍中皆冠酸酩,贝带,傅脂粉,皆闻、籍之属也。”《汉书·广川惠王刘越传》记载,昭信谓去曰:“前画工画望卿舍,望卿袒褐傅粉其傍。又数出南户窥郎更,疑有奸。”这就是“南户窥郎”的出处。

汉代文物之中,江西南昌海昏侯墓、长沙马王堆三号墓出土的妆奁内还有白粉、朱砂等化妆品。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画(车马仪仗图)中,男子的面部都涂得煞白,也显示出当时确有贵族男子敷粉的习俗。

汉代日照本地男子化妆习俗

汉代之初,无为而治,与民休养生息,经济逐渐发展繁荣。漆器制造业也空前发展起来且分工细致,漆器上经常铭刻该器物的产地和官署等。日照古城汉墓出土漆耳杯底部有漆书“莒卒”;临沂银雀山四号汉墓中出土的一件褐漆耳杯上有“莒市”“莒”等戳记,两件残黑漆彩绘耳杯上有“市府草”“市”戳记。这说明汉代莒地(今日日照市莒县)官府漆器制造业已非常发达。而海曲汉墓出土的漆器和上两处汉墓出土的漆器在形制和纹饰上较为一致,可推测这些漆器也是莒地制造的。

此外,与漆双层五子奁同时出土了39枚竹筒,其中一枚残筒上书写有“天汉二年城阳十一年”,城阳国的年号与汉王朝的年号对应出现在同一枚竹筒之上,或表明墓主与城阳国有一定的关系。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推测,西汉时期日照地区漆器制造业较为发达,漆双层五子奁很可能出自莒当地漆器作坊,日照地区富贵之家的男子也有使用妆奁化妆的习俗。